

索绪尔“符号学”设想的缘起和意图

屠友祥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符号学研究符号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活力,索绪尔把握了各个符号系统的共同点——社会性,从而把握住了语言符号的本质。语言符号的本质在言说的整体语言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由此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言说的整体语言。反过来,我们若要研究符号学,也必须从符号的主要系统——言说的整体语言着手,才可明晓符号学的基本问题。可见,索绪尔重视符号学,意在进行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首要真理,只有在符号创制出来以与概念相对应的一刹那,才是首要真理。一旦成为社会事实,任意性就无足轻重了,因为它与符号学系统攸关的社会事实不相干,而社会事实的核心就是对社会产物的被动接受。索绪尔一方面奉任意性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又以为它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一个想像而已,因为语言永远是一种既存、已在的状态,我们面对或身处的是社会事实。因此,符号对其所表示的概念而言,是任意的,对使用符号的语言社会而言,却是强制的。两者都是由集体决定的,这充分说明语言符号的本质是社会性。

[关键词] 符号学;言说的整体语言;文字(书写的整体语言);社会性;任意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5-0034-09

一、索绪尔提出符号学设想,意在界定语言学研究对象

1997年,日本学者小松英辅根据 Albert Riedlinger 和 Charles Patois 的课堂笔记整理出版了索绪尔的《第二次普通语言学教程》(*Deuxie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法文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符号学的论述。根据这些完整的材料,再结合索绪尔其他有关符号学的论断,我们可以明了他提出符号学设想的缘起和意图。

首先,索绪尔提出“符号学”观念有一个历史过程。1894年,在一篇有关惠特尼(W. D. Whitney)的未完成的论文里^①,索绪尔开始用 *sémiologie* 这一术语,提出“特定的符号学就是语言”^{[1] p.217}的说法。这意味着索绪尔认定语言是符号学的特定部分,或者说是符号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纳维尔(Henri Adrien Naville, 1845—1930)^②在其《科学的新分类:哲学研究》第五章“心理学科学”B节中

[收稿日期] 2004-11-1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2CWW001);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1FYY001)

[作者简介] 屠友祥(1963—),男,浙江萧山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

① 1894年12月27日至28日,第一届美国语文学家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惠特尼(1827—1894)在半年多前去世,大会的主题就是纪念惠特尼。1894年11月初,索绪尔收到了大会的邀请,但没能写完纪念会议的论文,仅留下了70页手稿。

② 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期间,纳维尔为艺术与社会科学系主任。

专讲社会学,其中引述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观念:

社会学是有关社会中有意识之存在——特别是人——的生命规律的科学……德·索绪尔先生强调一门极普遍的科学的重要性,他称之为符号学,其对象是创造的原则,符号转换及其意义的规律。符号学是社会学的根本部分。约定俗成的人类语言是符号系统的最重要部分,符号学科学最发达的是语言学或者说语言生命规律的科学。语音学和形态学主要是研究词,语义学研究词义……语言学家实际上摒弃了对语音学作纯粹是生物学(生理学)的解释,而是以正当理由把语言学看作心理学科学。语言学是……一门有关规律的科学。它永远与语言史和语法史明白地区分开来。^{[2] p.104)}

纳维尔确切地转述了索绪尔的观点,亦即符号学最主要的展现领域是语言学(语言生命规律的科学)。索绪尔后来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也明确提到这一点,他认为这门学科虽然还没有存在,但其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即语言学是这门一般学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确定的部分^{[3] p.38)}。索绪尔发现符号的特点是不直接示现事物,而是示现概念,即事物的意义。语言是由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契约而确立的一整套符号,这一特性与航海信号、军号信号、聋哑人的手势语、文字等的特性一模一样;语言是所有(符号)体系中最重要,但它不是惟一的^{[4] p.12)}。

其次,符号学和语言学在探讨规律上的一致性和亲和性,不仅使符号学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也是索绪尔关注符号学的重要缘由。他曾将两者等同:“可固定的任意的价值(符号学)=可固定的任意的符号(语言学)。”^{[1] p.333)}索绪尔把任意性看作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或第一真理,就因为这是符号学和语言学共同拥有的。

第三,将言说和文字作为区分的诱因,使得索绪尔特别关注符号学。1907年,他第一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谈到“言说的整体语言‘采纳’书写符号体系”时,约略但引人注目地提出整体语言中因这点而有两条符号学轴线,也就有两种语言科学,必须把言说的整体语言(la langue parlé)看作与书写的整体语言(la langue écrite或文字)不同的东西^{[5] p.22)}。到第二次(1908—1909)及第三次(1910—1911)讲授时,索绪尔明确界定言说的整体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书写的整体语言则是此真正对象呈现的外壳或外型^{[4] p.4[6] p.6)}。值得重视的是,索绪尔看到了两者的共同点,并在一开始就把“社会性”作为符号学研究的特性。他说:“文字和拼写规则(orthographe)的一个区分,在于后者具有被普遍接受的特性,为普遍用法所认可,拼写规则的研究因而是一种社会的研究,同时是一种符号学的研究。”^{[5] p.23)}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言说的整体语言上,也由于这是一种社会的研究,它具有整体性,具有被普遍接受的特性,这与文字的写法(拼写规则)所具有的特性一致。

索绪尔一再强调“符号系统”具有“集体特性”,是“社会产物”^{[1] p.289)}。社会集体性及其规则是内部要素,而不是外部要素^{[1] p.290)}。反过来,整体语言既然是一个符号系统,我们就自然而然需求助于符号科学。符号科学没有特别的部类,而据索绪尔的看法,语言在其中占据了要位,言下之意就是语言最适宜于符号学的研究。一般说来,要确定一个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征,无非就是找出它与其他事物的差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语言的最大特征是人的发音器官的作用,它产生的是听觉符号,在人心产生听觉印象,与航海信号、手势语等视觉符号截然不同。按照索绪尔对言说和文字的理解,言说的语言既然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应该重视发音器官才对,但索绪尔却认为发音器官仅仅对符号系统内部各种次一级的符号系统起区别作用,它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且只能在个体中得到研究^②,这并没有显明语言的本质。重要的是要发现语言“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

①《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亦提出“任意性的价值(像符号学那样可任意地固定)”之说。

②索绪尔认为:“发音器官只能在个体中得到研究。语法只能在群体语言(le langage)中得到研究。变化始自个体。”

统有什么共同点^[31 p.39] 这点弥足珍贵。索绪尔恰恰是把握了诸符号系统的共同点,也就是社会性或集体性才把握住了语言的本质,进而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整体语言^①。即个体运用群体语言,经集体的约定,从而形成整体语言。索绪尔解释道:“整体语言最根本的所在在哪里呢?群体语言在个体中被认做整体语言,这是群体语言的能力,但只有个体决不能达到整体语言的境地,整体语言绝对是社会之物。”^[61 p.111]

如此,就语言符号而言,只有在社会之物中才能把握语言符号的本质,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本质只可在整体语言中显现出来。可见,索绪尔重视符号学意在语言学研究,更确切地说,意在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他最终将研究对象确定为整体语言,就是从语言符号的本质在其中得以呈现这一点出发的。那么,语言符号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如何呈现?索绪尔认为:“这本质由那些最不被研究的事物所构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从一般的、哲学的角度思考整体语言的时候,与整体语言一起研究其他事物的时候,不能一下子见出符号学科学的必要性或特殊的有用性。整体语言逃离个体或社会意志的,就是符号的基本特征,初看起来它最不被呈现出来。若是从这方面来思考符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研究礼仪之类的时候没想到的诸多方面显现出来了,会看到它们归属于共同的研究领域,属于符号特有的生命,属于符号学。我们就此断言,整体语言不仅是它那一种类的东西,而且是环绕它周围的一切,我们把这范围内的一切宽泛地称为‘社会制度’,事物的某些部分需研究环绕着它周围的东西。”^[61 p.13]整体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这是语言符号的本质。但与其他社会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逃离个体或社会的意志,也就是说,个体或社会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它,而它只有置身于社会集体性之中才存在,才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为何需研究环绕着整体语言周围的一切呢?因为这些都属于符号系统的生命体。索绪尔打比方道:“符号学系统=不在船坞上而在大海上的船:我们无法先天地根据其船壳之类的形状确定其航向。这足以将整体语言视为社会、集体之物:只有海上的船,而不是陆上的船,才能放在船的类别里做研究对象。因而只有这种集体系统方配得上符号系统的名称。种种特征,亦即纯粹的个体因素,在进入集体性之前都是不重要的。符号系统为集体而不是为个体而构成,就像船为大海而造。这就是符号学现象任何时候都不忽视社会集体性事实的原因。这种社会本质是其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要素之一。我们因此把富有特征地呈现为社会产物的现象部分只确认为符号学现象部分,而不把完全个体的现象看作符号学现象。我们确定它的时候,就将确定符号学产物,经此,才能确定整体语言本身。这就是说,整体语言是一种符号学产物,而符号学产物是一种社会产物。”^[61 p.14]没有比末尾这句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索绪尔“符号学”设想的意图了。一句话,整体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这一点是经由整体语言是一种符号学产物,符号学产物是一种社会产物这一中介而看清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学产物、作为诸符号学系统其中的一个系统凸显和分离出来,是由于先把它纳入了符号学之中,在符号学中赋予了它最重要的位置。索绪尔说:“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符号学系统中决定把整体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分离出来。但我们得再次指出,如果我们对整体语言进行分类,如果它一开始并不仿佛是从天而降,这是由于我们把它归入了符号学的缘故。”^[61 pp.9-10]符号学研究符号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活力,将整体语言归入其中,自然而然就将其社会性突出了。反过来,我们若要研究符号学,也必须从符号的主要系统——整体语言着手。如索绪尔所认为的:“只有在整体语言中研究符号,我们才可知晓符号的基本方面、符号的生命。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若不是从整体语言角度研究,而是以心理学、语文学甚至大众方法研究整体语言,这时符号学问题就不会出现。”^[61 p.10]两者交互作用,各自都把对方的特征揭示

① 将 le langage 译成“群体语言”, la langue 译成“整体语言”, la parole 译成“个体语言”的诸般理由,可参见拙文《学术的进展和译名的重定》,载罗兰·巴特《屠友祥译《文之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194页。

得更为明白。然则确认了整体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有什么效用呢？

第一，表明整体语言是一个“同质性的客体”^{〔4〕p.79}、一个“完整体”^{〔4〕p.51}，呈现为“一个可抽析的整体，一个自成一体的机体”^{〔4〕p.74}，是“得到确认和约定之物”^{〔4〕p.75}。明白了这一点，对语言科学的研究极为有益，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对象，这是索绪尔的重大贡献，也是现代语言学得以成立的表征。

第二，表明是整体语言系统也好，符号系统也罢，都是“由连续的世代被动地接受的”^{〔6〕p.12}。整体语言作为社会产物或社会制度，是已经定型的、已被接受的，而不是处于创制阶段的，因为“在整体语言中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创制权”^{〔6〕p.11}。况且这种最低限度的创制权与整体语言事实并不相干，它不能支配整体语言事实。“最初的约定、契约是最不重要的，这不是与符号学系统相关的事实的核心。”^{〔6〕p.13}从这一角度来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首要真理，只在符号创制出来以与概念相对应的一刹那，才是首要真理，一成为社会事实，任意性就无足轻重了，因为它与符号学系统攸关的“事实”不相干，那“事实”的核心是对社会产物的“被动接受”。可见，索绪尔一方面奉任意性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又以为它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一个想像而已，因为语言永远是一种既存、已在的状态，我们面对或身处的是“事实”，我们无法探究语言形成的起源。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认可符号并不真正存在的刹那，只是理想（想像）而已。即便它的确存在，也不值得与整体语言的有规律的生命相并列来考虑。”^{〔6〕p.11}

第三，整体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亦表明了整体语言的存在价值。一般来说，每个个体先天都具有群体语言能力，但群体语言“面貌无定，乃是一个复杂多变、无章可循的领域”^{〔4〕p.74}，每个个体须无意识地依照集体认可并遵循的整体语言，具体地运用群体语言能力。索绪尔将这一过程界定为：群体语言 = 整体语言 + 个体语言。也就是说，人类心智固有且丛杂原朴的群体语言，经由个体语言的运用，才构成整体语言，具有规则和本质，进而反过来规约个体语言。正是个体经由言说，通过实施，形成了沉积和存储，让得以确认的形式更被确认，才使整体语言更具有整体语言的特性。对社会产物或事实的接受，“达到了在所有个体身上都明显一致的地步”^{〔4〕p.78}，这时候社会性就出现了，整体语言也真正形成了。“从社会角度认可了的联想总体，构成了居于大脑的整体语言。”^{〔4〕p.80}个体的言说是符号的运用和实施，并不是符号本身，不是符号的根本特征，索绪尔打比方说，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的演奏并不是奏鸣曲本身。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个体或个体言说呢？除了凸显整体语言的存在价值之外，索绪尔注意到：“个体更多地在我们能及的范围之内，并取决于我们的意志”，我们可以在个体身上把握“精神和物质的运作”^{〔6〕p.1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想要研究“言说的语言学（个体语言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e la parole）”的明显轨迹。况且就符号学而言，想要更深入地研究符号，就要研究“个体身上的符号机制”^{〔6〕p.11}。个体可以由我们的意志来把握，问题是，符号却具有逃离我们意志的特性。索绪尔觉得这是符号研究当中“最为有趣”^{〔6〕p.11}的方面。但这正是索绪尔没能实现个体语言的语言学（言说的语言学）研究的症结所在，它为我们预示了一个令人兴致盎然的领域。整体语言强制个体接受已成的语言符号，个体却有超越这种强制性的能力。各种修辞手段的创生正说明了这一点，也难怪有学者把修辞学认作索绪尔所称的“言说的语言学”。

第四，整体语言作为社会产物和社会事实，是集体性的表现和结果，语言必须经集体的确认或约定才有价值。“只有社会事实能创造整体语言中、符号系统中所是的东西，因为在任何领域内，除了凭借集体性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可言。”^{〔6〕p.117}惟有社会事实可创造整体语言的本质，社会事

① 索绪尔所谓的精神和物质的运作，就是概念和听觉印象的联结；“听觉印象不是物质的声响，而是声响的精神印记”。两者都居于主体之内，都是精神的，只是听觉印象相对于概念来说更具物质性而已。

实是形成整体语言及符号系统的价值的源泉,因而要把价值赋予给整体语言、符号系统。

二、以符号学处理文字,指归则在处理言说的整体语言

在索绪尔之前,人们已尝试从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语文学、语法学等角度研究语言,但这些析分的路径在索绪尔看来都没有什么成效,他认为需要走综合的途径,即符号学。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揭示了三个语言对子(1)书写的整体语言和言说的整体语言(2)个体语言和整体语言(3)历时态和共时态。索绪尔强调语言学只研究言说的整体语言,但为什么又关注书写的整体语言——文字呢?原因即在文字也是一个大的符号系统,有其功能和特性。“文字系统具有表现(言说的)整体语言系统的惟一的使命。^{[4] p.48)}视觉的文字再现了听觉印象的结构;文字的符号系统最接近于(言说的)整体语言的符号系统^{[6] p.113)}。索绪尔的最终指归在于将书写的整体语言与言说的整体语言区分开来,这时他必须处理文字,于是就构想了比语言学有更大包容度、可以处理文字这一符号系统的符号学。况且,只因(言说的)整体语言被写了下来,对处于时间中的整体语言进行分类才是可能的^{[6] p.5)}。文字的符号系统纪录了言说者已经认知的语言单位或结构,则文字本身成为认知语言单位或结构的框架、规则和媒介,为思考言说的整体语言结构提供了概念和范畴。也就是说,索绪尔意识到言说的整体语言结构恰恰是文字的符号系统导致的结果,因为“只有书面语言能成为文学语言……书面语言能成为规范^{[6] p.6)}。而关注规则,就是关注集体共同的约定性和社会性,就是关注价值(价值能够赋予意义)。规则以纯粹形式的面目出现,与表现这规则的材料、内容无关,就譬如与棋子是木头或象牙无关一样。而“凡关涉到形式的一切事物,必定都归属于符号学^{[6] p.114)}。索绪尔就是基于此而屡屡提出整体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3] p.169)}。

索绪尔将符号学体制引进语言学,是因为“这些符号体系内左右着变化的种种规则,总是与支配着语言变化的种种规则适相类同^{[4] p.10)}。而把符号学体制进一步集聚于文字(书写的整体语言)则主要是为了将文字与言说的整体语言这两个符号系统进行比照,以求发现它们的共同点,进而发现语言的本质。而文字本身则是除言说的整体语言外“最重要”的符号系统^{[6] p.7)}。《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专设一章讲“文字表现整体语言”,认为文字符号系统是言说的整体语言符号系统的“仆从或影像^{[4] p.48)},但文字这一视觉符号“可与发音现象相比较”,不能不说是索绪尔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4] p.10)}。对此,索绪尔指出:

在文字中,我们拥有(1)符号的任意特性,符号与其表示的事物没有关联(2)文字符号具有区别的价值,它只从差异处获取其价值(3)文字的价值是相对的,价值在于相对(4)产生符号的手段和材料完全是无差别的、无所谓的。^{[6] p.113)}

这些特征也都在言说的整体语言中发现。关于第一点,符号与其表示的事物以及事物的意义没有关联,可以说道尽了符号应有的空洞性的意蕴。符号表示事物,但符号与它要表示的事物一样,也是一种事物、一种存在,因此,符号一方面揭示事物,一方面又因自身的存在本性遮蔽了所要表现的事物。笔者认为,这是必须使符号空洞化的原因所在。索绪尔明白地区分了“符号(signe)和“象征(symbole),他取的准绳就是符号是空洞的,不可论证的,而“象征绝不是空洞的^{[4] p.85)},譬如“天平”象征“公平”,两者之间有着关联,是可以论证的,因而不是完全任意的。如果把符号自身的存在特性抽掉,符号和事物之间不存在内部关联,那么,符号的任意性就凸显出来了。所谓任意性是就符号和事物间没有特定关联来说的,不是指“个体的自由抉择^{[4] p.86)}。索绪尔指的“任意性”,正是集体意志得以施展的场所,这与整体语言的社会性直接相关。符号和事物间的关系一经确立,一经集体的约定,就毫无任意性可言,呈现出来的是强制性,这时候符号开始逃离

个体或集体的意志。因此,我们可以说索绪尔标举为第一原则或首要真理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完全是由符号的本质决定的。符号的本质就是不呈现符号内在固有的价值,而是抽空它,人们以集体约定的方式拿空洞化了的符号任意地表示事物。索绪尔举中国人曾经三跪九叩拜见皇帝为例,说明并不是这种礼节符号的内在含义,不是象征,而是使用这种礼节符号的约定的规矩在起表示的作用。“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31 p.103),这是他借助总体符号的特征从根本上凸显语言本质的最有力的方面。索绪尔说:“种种符号都是非个人的(除了细微差别之外,但我们对整体语言的符号可以说同样的话),个体无法变更符号,符号永存于个体之外。标出程度和差别,将是符号学的一个任务。如此,整体语言符号完全是任意的,而在某些礼仪行为里,符号消除了这一任意性,而向象征(symbole)靠拢。”(61 p.10)

关于第四点,我们可用任何材料铭写文字,言说的整体语言也是如此,“我们总是凭发音器官讲话,但我们若不是用发音器官来表达语言,我们的语词的本质也并没有什么变化”(61 p.113),这就赋予了实施手段无足轻重的意义。语言运用的不是出自自然的能力,而是缘于社会的能力。索绪尔在这点上援引了惠特尼的观点:“人类使用喉、唇、舌来讲话,说到底还是出于偶然。他们觉得这非常方便。但倘若他们使用视觉符号或手势,归根究底还是同样的语言,不会有任何差异。”(41 p.9)无论是听觉符号还是视觉符号,都是一种社会性约定的结果,因而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使用什么手段和材料来产生符号反而无关紧要了。索绪尔第二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时,在同意惠特尼的前提下,还是说他“走得太远了”(61 p.3)。到第三次讲授时,则说惠特尼认为“语言一般属于社会制度的大类别,这看法让人震惊,就此而言,他在正确之道上;他的思想与我相契”(41 p.9)。就当时的学术背景而言,这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之前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 1823—1900)特别注重发音器官,新语法学派也把语言视为个人心理—生理活动的产物。而在索绪尔看来,发音动作并不构成语言,即使把“发音器官的动作都解释清楚,也并没有阐明语言的问题”(31 p.60)。言说之声音的生理学也不属于语言学,语言学家不关注整体语言的发音分析,“重要的是观察产生各类声音的机制”(41 p.62),这个机制就是听觉印象。只有根据听觉印象,才能分析声音的各个单位,而听觉印象本身是可感而不可分析的。索绪尔拿整体语言与花毯相比拟:花毯构设的形成在于色调的搭配,以此产生连续的视觉印象,而染匠如何用纱线染色这一手段是无关紧要的。与此相类,要紧的是声音产生的听觉印象。整体语言“是基于听觉印象的符号系统”,“概念与符号的联想结合,正是这点构成为整体语言的本质”(41 p.80)。索绪尔因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整体语言是一个基于不可分析的听觉印象的体系(f与b的差别)。(41 p.62)这种差别纯粹出自听觉印象,不能单一地、与b析分开来探究f。这也与文字符号的第二个特征——“从差异处获取价值”一致,譬如文字T和L的书写差别。有差别,就意味着可比较、可交换,能产生价值,也意味着一变而俱变的关系;而比较、交换、关系都是由集体经约定而赋予的。索绪尔认为:“任何一个符号学系统都是由许多单位构成,这些单位的真正本质……在于它们是价值。诸单位的这个系统是个符号的系统,是个价值的系统。一切可以在价值方面确定的东西也都可以以一般方式运用于那些是符号的单位……价值是:我们一谈到种种价值,它们的关系就开始起作用。任何价值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这意味着符号只有经集体的确认才会拥有其自身的价值。符号看起来似乎有两个价值(一个是价值本身,另一个价值源自集体性),但这终究是同一个价值。”(61 pp.13—15)有差异,才产生价值本身,而这差异基于集体共同确认的听觉印象,因而是同一个价值。

构成符号学单位的本质在于这些单位是价值。“整体语言在其他符号学系统当中不管处于什么位置,我们确定它是一种价值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固定了它,必须在集体性中发现它的基础;正是集体性创造了价值。”(61 p.16)价值涉及不同事物间的等价系统,在语言符号中是所指和能指,

一如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和工资”^{〔3〕}(p.118)。语言符号由价值构成,而价值最初是任意的。所指和能指一经集体的约定,其价值就被固定了,这是约定俗成的价值,而后的发展则不受集体或个人的制约。索绪尔打比方说就像鸡孵鸭蛋,鸭子既已孵出,它的生长就不再受鸡的支配。“符号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作为一个特征被传递,只要与那些创制符号者没有干系……整体语言有点像鸡孵鸭!一旦创制的时刻过去了,整体语言进入其符号学生命过程中,我们就不再能把它拉回来:它由规则传递下去,这规则与创造的规则没关系。”^{〔6〕}(p.12)创造的规则就是任意性,创造之后的规则却是不变的,这是符号学的规则。比如下棋,规则在下棋之前及下每一着棋之后都存在着^{〔3〕}(p.128),惟一的区别是下棋者是有意识的,每移动一子,都意欲对系统产生影响,而“语言移动一下(一个历时性的变化),就一点也不是预先想好的”^{〔4〕}(p.133),其间充满了偶然性。“变化出来的状态并不是注定了要表达它所包含的意思的,等到出现了一个偶然的状况:föt:fēt,人们就抓住它,使它担负起单复数的区别;为了表示这种区别,föt:fēt并不就比föt:*föti更好些,不管是哪一种状态,都在一定的物质里注入了生机,使它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3〕}(p.124)由此,索绪尔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状态=词语的偶然状态”^{〔4〕}(p.130)。符号从差异处获取其价值,föt:fēt有差异,就产生价值。并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差异,即便“X/零”也行,因为这也已经具备差异。这充分说明语言状态是一种偶然的状况。价值的形成正在于两项共存而对立的要素:它们或是能交换的异物,即所指和能指,譬如20法郎的硬币与数斤面包,这是符号内部的差异关系;或是可比较的同物,系统中共存的诸符号之间的相对关系,譬如20法郎硬币与1法郎硬币比较,这正是前面引述索绪尔的文字及言说的整体语言的第三个特征——“价值在于相对”的意义所在。索绪尔就由可比较的同物出发,研究了语言符号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联想关系),也展现了整体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特性。他指出:“只有经共存要素的会合,才能确定词语的价值,共存要素划定了词语价值的界限……只有经围绕词语而存在之物的会合,才能确定词语之内的存在之物(词语之内的存在之物就是价值)——围绕词语的方式,或是以横组合关系,或是以联想关系,着手从外部来探讨词语,必须从系统及共存要素出发。”^{〔4〕}(pp.156-157)这就是说,价值取决于处在外部的某物,要素的价值是由围绕着它的其他共存要素决定的。索绪尔举décépité(衰老)和décépi(灰泥剥落)为例阐述这一点^{〔4〕}(p.126),他认为两词在词源上没有什么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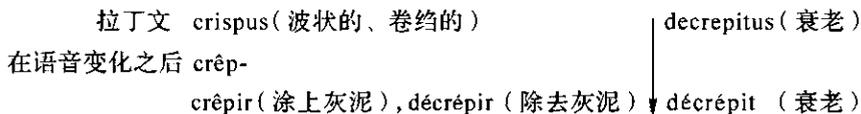


图1 要素共存与价值确定

但在 *un mur décépi*(一堵灰泥剥落的墙)和 *un vieillard décépité*(一个老头儿)中,*décépi*与*décépité*之间由于共存而产生了联想关系,趋于类同、混合。从共时态看,这说明词语状态是一种偶然的状况;从历时态看,发展到目前的情景,说明词语状态可以完全不受言说者意愿的支配,语言也并没有预先想好要发展到这一步。再者,*décépi*与*décépité*的意义是由*mur*和*vieillard*确定的,也就是说,要参合横组合关系的相互关联才行,它们并不仅仅由自身内部的所指和能指相异的交换来确定(所指只是价值的概括而已),还需与可比较的(类)同物及共存要素来确定(须考虑到处在每一语言系统中各要素的交互作用),由这两方面形成价值,并确定意义。索绪尔从系统出发看待要素、确定要素,再从要素出发看待价值、确定价值。

从差异获取价值,有单个符号内部的差异(所指和能指),也必有各个符号之间的相对、比较和

类同,因而价值基于相对。文字符号和言说的整体语言符号的第二个特征(从差异处获取价值)从而可归结为第三个特征(“价值在于相对”)。能指对其所表示的所指而言,是任意的,能指对使用能指的语言社会而言,却是强制的,这充分说明符号的本质是社会性。目前的索绪尔研究存在一个偏向,就是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语言符号的社会性,而任意性其实正是由社会性导致的。

三、结 论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索绪尔提出“符号学”构想的意图在于解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他着眼于整体语言(*la langue*),而不是个体语言(*la parole*)。原因就是整体语言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约定的社会制度,语言符号的本质在其中充分地呈现。索绪尔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心目中语言学明确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也为了巩固对整体语言社会性的看法,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注到完全具有社会约定性的符号学上来。他把符号学看作具有社会性的代表,继而把语言学阐释为符号学的一部分,则语言学的特性自然也就是社会性,这主要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设立的,索绪尔仔细分析语言学中哪一种因素最具有社会性,那么,这种因素(整体语言)就是语言学要研究的对象。他进一步将整体语言析分为言说的整体语言和书写的整体语言(文字),在符号学体制内比较两者的共同特征,显现文字的功用,最后把言说的整体语言确定为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参 考 文 献]

- [1] F. D. Saussure. *Ē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C].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2002.
- [2] H. A. Naville. *Nouvelle classification des sciences. étude philosophique*[M]. Paris :F. Alcan ,1901.
- [3] 索绪尔(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 索绪尔(屠友祥译).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5] F. D.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 d'après les notes de Riedlinger et Constantin* [M]. Tokyo :Université Gakushuin ,1993.
- [6] F. D. Saussure. *Deux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08—1909) d'après les cahiers d'Albert Riedlinger et Charles Patois*[M]. Oxford :Pergamon ,1997.

[责任编辑 徐 枫]

The Genesis and Intention of Saussure 's *la sémiologie* conceptions

TU You-Xiang

(*Th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Henan University , Kaifeng 475001 , China*)

Abstract : Semiology deals with the sketch of a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that studies sig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life. By including *la langue parlée* in semiology to feature sociality , we are able to classify *la langue parlée*. As Ferdinand de Saussure grasped the common ground of systems of signs : sociality , he grasped the essence of linguistic signs , which can be visualized in *la langue parlée*. Consequently , he delimited the object

of linguistic study : la langue parlée. Conversely , if we want to study semiology , we should start with la langue parlée , the main system of signs , so that we can be clear enough about the elements of semiology . It is thus evident that Saussur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semiology for the purpose of delimiting the object of linguistic study .

But the visual writing represents the structure of l 'image acoustique. Classifying la langue parlée in time is possible only when we write it. The sign system of writing serves to mark linguistic units and structures already perceived by speakers , thus the writing becomes the frame or way or medium for perceiving linguistic units and structures , and provides the notions and categories for speculating the structures of la langue parlée , namely , it results from the sign system of writing to perceive structures of la langue parlée , because the writing becomes the norm and model.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orm is me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vention and sociality of collectivity , and to the value as well. The norm appears in pure forms , and everything that concerns forms must be part of semiology.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 there are values , and differences are based upon l 'image acoustique which is sanctioned by the collectivity. It is the collective convention that creates social facts and values .

It is really the primary truth that the linguistic sign is arbitrary , only in a flash while the sign which is created corresponds to concept. However ,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the sign is of no importance as soon as the sign becomes a social fact , because it is independent of the social fact relative to a semiological system. The heart of the social fact is that we receive passively the social product. In other words , Saussure regarded the arbitrary nature 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he linguistic sign on the one hand , and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that it does not really exist. For la langue is already in existence for all time , and what we are in and confronted with are social facts. Therefore , the sign is arbitrar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cept ,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ign , while in terms of the language community in which the linguistic sign is used , it is conventional. Both are sanctioned by the communit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nature of linguistic sign is sociality .

Key words : sémiologie ; la langue parlée ; l 'écriture (la langue écrite) ; sociality ; arbitrary nature ; value

本刊讯 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承办的“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6月18日至19日在杭州隆重举行。家族企业在当代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已越来越为各界所关注。在我国浙江,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活力源泉,是所有制优势、市场先发优势、区域产业优势的集中体现。本次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请到了国内外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在这次大会上,Jesus Casado教授(西班牙)、Li-Choy Chong教授(瑞士)、李新春教授、储小平教授(中山大学)、韩朝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臧旭恒教授、杨惠馨教授(山东大学)、甘德安教授(江汉大学)、许琳博士(美国)等与来自香港地区、北京及浙江的企业家同台交流,共商民营企业成长和发展问题,并围绕“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这一核心议题,就创业和中小企业成长、创业教育、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成长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